

# 在野黨的選舉策略與優勢政黨的敗選： 伊斯蘭黨與2018年馬來西亞國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游雅雯\*\*

## 《摘要》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以來，國民陣線（國陣）長期執政，並維持競爭式威權體制逾61年，直到2018年5月才首次政黨輪替。目前探討馬來西亞競爭式威權體制為何垮台的既有文獻指出：馬來西亞都市化的趨勢以及馬哈迪因素是造成執政精英分裂為解釋國陣敗選之兩大可能原因。本文結合政黨政治與族群投票的理論視角，主張伊斯蘭黨的政黨目標改變亦是導致國陣敗選的關鍵因素之一。具體而言，伊斯蘭黨的政黨目標從「追求官職」轉向「追求政策」—為了推動伊斯蘭化政策，伊斯蘭黨退出了過去二十年所加入的在野聯盟，因為民主行動黨時常與其因伊斯蘭議題發生衝突。結果伊斯蘭黨自立門戶之後，反倒成功吸引了那些先前對於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結盟有所疑慮的馬來穆斯林選民。因此，本文假設伊斯蘭黨的參選將會對國陣的選舉表現造成影響。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文利用馬來西亞半島（西馬）165個國會選區在2018年國會選舉的資料進行量化分

---

\* 感謝科技部專題計畫（計畫編號：MOST-107-2410-H-032-067-MY2）的經費支持，使本研究可以順利完成，同時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惟本文之可能的疏漏與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助理教授。yawenyu@gms.tku.edu.tw。

析。實證結果顯示，當伊斯蘭黨候選人與國陣候選人在同一國會選區競選時，國陣候選人會獲得較少的選票支持。

**關鍵詞：**馬來西亞、伊斯蘭黨、民主轉型、競爭式威權體制、國民陣線

## 壹、引言

馬來西亞自195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先是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 UMNO，簡稱巫統）、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印度國大黨(Malaysia India Congress, MIC)合組「聯盟」(*Perikatan*, The Alliance)共同執政，而後自1973年起，該執政聯盟擴大為由14個政黨所組成的大聯盟政府，並更名為「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 BN，簡稱國陣)。<sup>1</sup> 國陣及其前身一聯盟一自馬來西亞獨立後總共連續贏得13次全國大選，執政逾61年。國陣得以長期執政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為善於運用族群政治議題，<sup>2</sup> 具體來說，國陣在選舉時透過提名族群代表作為候選人，以此訴求選民只要支持國陣，各族群在國會將獲得代表性並能組成跨族群內閣。於是，許多學者發現，長期以來國陣的族群動員確實有助於國陣維持選舉優勢並得以長期執政（王國璋 2018；宋鎮照與洪鼎倫 2018；孫采薇 2016；游雅雯 2017；Kananatu 2018）。因此，有學者稱馬來西亞為「種族威權民主國家」（祝家華 1994, 39）或「選舉威權體制」（Nadzri 2018）。因為國陣的長期執政在2018年國會大選後遽然劃下句點，本文欲探討的研究問題為是什麼因素造成國陣的敗選。

在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中，主要有三個政黨聯盟相互較勁，分別為國陣、「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簡稱希盟）與「和諧陣線」（*Gagasan Sejahtera*, GS，簡稱和陣）。希盟的主要成員包括兩個跨族群政黨，亦即以華人為主的民主行動黨(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sup>3</sup> 以及前馬來西亞副首相安

<sup>1</sup> 國陣除了包括三大族群政黨外，也包含一些區域型政黨，例如：以檳城為主的民政黨、以霹靂州為主的人民進步黨，另外還有東馬沙巴、砂拉越的區域性政黨。

<sup>2</sup>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10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馬來西亞的族群結構主要為馬來人（含原住民）佔67.4%、華人24.6%、印度人7.3%，其他族群為0.7%。請見[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menu\\_id=L0pheU43NWJwRWVVSZklWdzQ4TlhUUT09&bul\\_id=MD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j09](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menu_id=L0pheU43NWJwRWVVSZklWdzQ4TlhUUT09&bul_id=MD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j09)，檢索日期：2020年6月15日。

<sup>3</sup> 民主行動黨成立於1966年3月9日，是新加坡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之後，一些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黨員在馬來西亞組成的政黨。該黨黨員以華人為主，但也有其他族裔的黨員。例如2004年到2014年的民主行動黨主席卡巴星(Karpal Singh)為印度裔。

華(Anwar Ibrahim)所領導的人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sup>4</sup>此外，希盟亦包括兩個以爭取馬來人權益為主要的政黨，分別是伊斯蘭開明派人士所新組成的國家誠信黨(*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以及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所成立的土著團結黨(*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PPBM，簡稱土團黨)。<sup>5</sup>

除了希盟外，另一個在野聯盟為和諧陣線，其主導政黨為泛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簡稱伊斯蘭黨)。伊斯蘭黨成立於1951年11月24日，是個宗教性政黨，其政治勢力範圍以北部的吉蘭丹州及東部的登嘉樓州為主。1959年到1972年，伊斯蘭黨曾統治過吉蘭丹州；1973年到1977年，該黨加入國陣成為執政聯盟的一員；1977年，伊斯蘭黨被逐出國陣。從歷史上來看，從1990年至2013年的六次大選，伊斯蘭黨皆加入在野黨聯盟合作競選。<sup>6</sup>2015年6月15日，伊斯蘭黨因伊斯蘭刑法(*Hudud*)議題與民主行動黨爭執不下，民主行動黨主動宣布與伊斯蘭黨斷交，造成6月17日民聯正式解體。在民聯解散之後，伊斯蘭黨改與其他小黨組成和諧陣線參與2018年大選。

2018年大選國陣大敗，僅贏得國會222議席中的79席(席次率35.58%)，頓時失去執政權，也讓馬來西亞出現首次的政黨輪替。<sup>7</sup>其中，國陣的主導政

<sup>4</sup> 人民公正黨前身是1999年「烈火莫熄」(*Reformasi*)年代成立的國民公正黨，後來2003年該黨跟馬來西亞人民黨合併，才成為人民公正黨。人民公正黨自1999年起由安華的妻子旺阿茲莎(Wan Azizah Wan Ismail)領導，直到2018年安華被特赦出獄、並補選成為國會議員後，安華才正式擔任黨主席。

<sup>5</sup> 土團黨於2016年9月9日成立，其為2016年2月馬哈迪退出巫統後，與前內政部長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馬哈迪兒子慕克里(Mukhriz bin Mahathir)所共同創立的政黨，其黨員主要是不滿納吉政府而退黨的巫統黨員。2017年3月20日，土團黨加入希盟，但2018大選之前，社團註冊局撤銷土著團結黨的註冊，並勒令土團黨解散，因此，土團黨在選舉期間使用公正黨旗幟參選。

<sup>6</sup> 1990年以來馬來西亞「兩線政治」的在野黨聯盟包括：1990-1996年的「人民陣線」(*Gagasan Rakyat*)，1999-2004年的「替代陣線」(*Barisan Alternatif*，替陣)，2008-2015年的「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民聯)，而2015年之後的在野黨聯盟改名為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希盟)，伊斯蘭黨這次並未加入希盟，而是獨立組成「和諧陣線」，與國陣、希盟分庭抗禮。

<sup>7</sup> 雪上加霜的是，原先在國陣旗下參選的砂拉越地區政黨於2018年6月12日宣布退出國陣，改組「砂拉越政黨聯盟」(*Gabungan Parti Sarawak*)，並在11月19日完成政黨註冊。此舉讓國陣的國會議席再減少了19席，只剩60席，在國會中掌握不到1/3的席次。

黨——巫統——只贏得54席，較上次選舉的88席再減少了34席，創下史上最低席次。馬華公會僅獲得1席，較上次選舉退步了6席，而印度國大黨則贏得2席，較上次選舉也退步了2席。另外，就希盟的選舉表現而言，<sup>8</sup> 人民公正黨獲得48席，民主行動黨42席、土著團結黨12席、國家誠信黨11席，若加上合作的沙巴民族復興黨(*Warisan*)，希盟在此次大選取得121席國會議員席次，席次率為54.50%。至於和諧陣線，其成員黨只有伊斯蘭黨贏得18席（席次率為8.11%），與2013年大選相比雖然減少了3席，此乃因為伊斯蘭黨保守派與開明派分裂所致（相關討論詳下），所以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伊斯蘭黨的退步。

為何國陣在2018年國會大選失利？有些研究指出納吉政府涉及「一馬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貪腐弊案，讓許多馬來選民失望，於是憤而支持在野黨，可說執政黨大敗的主因(Rahman 2018b; Welsh 2018)。然而，國陣長期以來早已飽受貪腐批評，所以這個論點並無法有效解釋2018年國陣垮台的時機。從結構面的角度來看，有不少文獻認為前首相馬哈迪離開巫統另組新黨，造成執政的精英集團分裂乃是國陣敗選的關鍵因素(Abdullah 2019; Chin 2018; Moniruzzaman and Farzana 2018; Nadzri 2019)。儘管馬哈迪的出走固然是造成國陣選舉失利的因素之一，但若只聚焦討論馬哈迪對於選舉的影響，可能會忽略其他更重要的背景脈絡。因為在此次大選中，除了巫統出現政黨分裂，連在野黨聯盟也出現了分裂，一方面是伊斯蘭黨內開明派人士退黨後改組誠信黨，另一方面則是繼續執掌伊斯蘭黨的保守派則與希盟切割，改與其他小黨結盟為和陣並參選。因此，在巫統內部分裂，且在野黨陣營也不甚團結的情況下，過度放大馬哈迪因素對於此次大選結果的解釋力有待商榷。

有學者指出，2018年大選在野陣營的勝選是意外勝利，而國陣的敗選同樣是出乎意料之外（潘永強 2019, v）。由於此次的政黨輪替不但有助馬來西亞民主轉型，也為「競爭式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垮台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因此本文認為值得深入研究。為了補充相關文獻，本文結合政黨政治與族群投票的理論視角，主張伊斯蘭黨政黨目標的改變是讓國陣選舉

---

<sup>8</sup> 關於選舉結果的資料引用網址，請見<https://election.thestar.com.my/>，檢索日期：2020年8月15日。

策略失靈的關鍵因素。自1990年以來，伊斯蘭黨長期與以華人為首的跨族群政黨——民主行動黨結盟，其目的主要在於追求勝選以爭取執政權。然而，伊斯蘭黨卻常常在選前被執政的國陣批評為「馬來人的叛徒」(Frith 2007, 127)，因而使許多馬來選民不願支持伊斯蘭黨。由於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時常因伊斯蘭議題發生衝突，所以伊斯蘭黨在2015年決定與民主行動黨斷交，並退出原本的在野聯盟——民聯。在2018年大選時，伊斯蘭黨堅定其推動伊斯蘭化的理念，只跟支持伊斯蘭議題的小黨組成和陣，與國陣和希盟分庭抗禮。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伊斯蘭黨的候選人成功吸引了那些之前對於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結盟有疑慮而不敢投給伊斯蘭黨的馬來選民，此便促成了馬來西亞首次政黨輪替。

本文將在下一節將探討競爭性威權體制轉型的理論觀點，以及在野黨選舉策略對於執政黨選舉表現的影響，並從政黨政治與族群投票的理論出發，應用於解釋馬來西亞2018年大選國陣何以敗選的原因。在第三節，本文將利用量化模型，檢證伊斯蘭黨是否有對巫統選舉表現造成影響。在第四節，本文將探討伊斯蘭黨的歷史發展及其在2018年大選的競選過程與策略。最後，本文將作一總結。

## 貳、解釋競爭性威權體制轉型的理論觀點

### 一、為何競爭性威權體制的執政黨會敗選？

民主轉型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議題，許多學者探討威權國家「為何」及「如何」轉型為民主體制(Mainwaring 1992; Monshipouri 1995; Parry and Moran 1994; Przeworski 1991; Sorensen 1993)，有些研究更指出「競爭式威權體制」是較難發生民主轉型的威權政體類型(Levitsky and Way 2002)。首先是因為這類政體有舉行定期選舉，比那些沒有舉行選舉的威權政體更為長壽(Gaddes 1999)，原因在於定期選舉可作為政治洩壓閥。另外，這類政體允許在野黨參選，具備「形式民主」的特徵(Case 2009)，使得人民某種程度失去了以革命推翻政權的正當性(Brownlee 2009)。以上這些因素皆讓競爭式威權政體具

備一定程度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使得執政黨能長期執政，同時也延遲了民主轉型的進程(Brownlee 2009; Diamond 2002; Levitsky and Way 2010; Schedler 2002)。

儘管如此，競爭式威權體制並非完全不會崩潰，因為實際案例證明有些威權政體在長期執政一段時間後亦會出現敗選、垮台的危機，不禁令人好奇是什麼因素會造成這種情況呢？過去文獻主要聚焦於執政精英團結的程度與威權統治穩定之間的關係，主張執政集團的精英分裂(elite splits)會分散選民的支持，因而提高競爭式威權體制垮台的可能性(Brownlee 2009; Magaloni 2006;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相對而言，近期有文獻指出，雖然競爭式威權體制的在野黨因為長期扮演「忠誠反對黨」的角色而得以生存(Albrecht 2010)，但如果他們能運用有效的選舉策略，也有可能對於執政黨造成威脅、甚至促成民主化(Bunce and Wolchik 2010; Donno 2013; Howard and Roessler 2006)。特別是，在野黨若能在選前組成有效的政黨競選聯盟，或運用有別與以往的新穎競選策略，極有可能是讓競爭式威權體制轉型成民主體制的關鍵因素(Donno 2013; Howard and Roessler 2006)。Valerie Bunce及Sharon Wolchik(2010)在研究後共威權國家轉型便發現，許多在野黨運用新的選戰策略，來增加他們勝選的機會，這些策略包括：組成團結的在野黨聯盟、鼓勵選民註冊、提升年輕選民投票率、與公民團體合作、派員監票、執行出口民調等等(Bunce and Wolchik 2010: 68-69)。Bunce及Wolchik(2010)的研究得到兩個結論：一、執政黨所建構的結構和制度因素，的確會限制在野黨的勝選機率，但在各國的影響力並不一致。二、該研究發現另一個造成執政黨敗選的共通因素為：該國的在野黨是否能有效運用新穎的競選策略來吸引選民的支持。

馬來西亞長期以來被視為競爭式威權體制的代表案例(Case 2009)，而2018年國會選舉可說是該國政治轉型的關鍵選舉。有不少研究在解釋國陣的敗選時，也特別著重執政集團精英分裂的影響，亦即認為馬哈迪退出巫統、另組土著團結黨並加入在野選舉聯盟與國陣的敗選有相當直接的關聯(Abdullah 2019; Chin 2018; Moniruzzaman and Farzana 2018; Ostwald and Oliver 2020)。<sup>9</sup> 另外，

<sup>9</sup> James Chin(2018, 8)指出，希盟這次能在許多馬來鄉村選區獲得支持，主要是因為其代表

也有不少學者探討在野黨競選策略在此次選舉的作用，主張希盟的團結形象以及有效的競選策略，是吸引選民轉而支持在野陣營的重要因素(Lyndon and Mohamed 2017, 361-362; Ganti 2020, 262; Hutchinson 2018, 15; Lemièrè 2018, 116; Moten 2019, 513-516; Ufen 2020)。然而，幾乎沒有文獻特別探討伊斯蘭黨對國陣敗選所產生的影響，此乃本文的最大貢獻。

## 二、在野黨選舉策略對於執政黨選舉表現的影響

目前關於解釋馬來西亞2018年選舉結果的學術研究方興未艾，集體的合作成果主要有Chin-Huat Wong與Kee Beng Ooi(2018)所主編的專刊、James Chin與Bridget Welsh(2018)所主編的專刊，以及Edmund Terence Gomez及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m(2020)的編著。這些文獻雖然從各個角度對於此次選舉進行分析，其觀點各有所長，但主要都是利用新聞資料進行探討與詮釋，缺乏系統性的量化實證分析。雖然有些文獻對於在野黨的選舉策略有所著墨，但主要是集中在對於希盟的討論，而對於伊斯蘭黨競選策略在此次選舉的角色，則缺乏較全面且細膩的分析。與這些既有文獻不同的是，本文的獨特之處在於結合政黨政治與族群政治理論的理論視角，利用量化資料對於此次大選的結果提出系統性的驗證。本文認為，伊斯蘭黨在此次選舉政黨目標改為推動伊斯蘭化政策，因而採取不同以往的競選策略，乃是影響國陣敗選的關鍵。

根據Kaare Strøm(1990)的政黨行為理論，一般而言，政黨的目標大致可分「追求選票」(vote-seeking)、「追求官職」(office-seeking)或「追求政策」(policy-seeking)<sup>10</sup>等特性，而這些特性會形塑他們是否與其他政黨結盟的考量(Kellam 2015; Golder 2005; Strøm 1990; Wahman 2011)。若一個政黨的主要目

---

人物馬哈迪被公認為馬來民族主義者，深獲鄉村馬來選民的認同。另外，Walid Jumblatt Abdullah(2019)亦提到馬哈迪具有值得信賴的個人特質與領袖魅力，而且在其執政期間也頗有政績(1981-2003)，也是讓許多選民支持希盟的另一個因素。

<sup>10</sup> 我們感謝編委會的提醒，特別在此說明所謂policy-seeking一詞通常被翻譯為「政策尋求」(請見Evans 2018, 2)，此與政黨意識形態的左右派及其政策路線有關。然而，亦如Evans所指出，有些政黨的意識形態並無法以用左派、右派來涵括(Evans 2018, 7)，而本文所探討的伊斯蘭黨正是其一。因此，本文只是借用此概念來說明伊斯蘭黨會因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標而改變選戰策略，於是，此處翻譯為「追求政策」。



標是爲了追求進入政府謀求職位，則該黨在決定是否與其他政黨結盟時，並不會特別考量彼此間的意識型態差距(Leubbert 1986)，而是會較務實地爲了勝選與其他政黨組成選前聯盟，例如伊斯蘭黨在民聯時期與意識形態差異大的行動黨合作。此時該黨主要考量的是勝選後如何分配利益與政府職位，而非未來的政府施政走向(Sithanen 2003, 3)。自1990年起，伊斯蘭黨爲了爭取執政權，在歷屆選舉皆與意識型態大相逕庭的民主行動黨、公正黨合作，組成選舉競選聯盟共同參選，與國陣形成兩大陣營對壘的「兩線政治」(two-coalition system) (祝家華 1994)。當時的伊斯蘭黨認爲只要能夠勝選、取得政府大位，不需考慮結盟合作的其他政黨的屬性及其意識形態爲何，因爲那時伊斯蘭黨的政黨目標只爲勝選及追求官職。

但若一政黨的主要目標是爲了追求實踐特定的政策，則該政黨在選取結盟政黨時，將會堅持政黨的政策路線與目標，不會與意識形態差異太大的政黨進行合作(Indridason 2005, 440)，於是，我們可看到伊斯蘭黨在2015年宣布與民主行動黨分道揚鑣、並退出民聯，開始重建伊斯蘭黨的政策路線。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及保守派成員一改過去二十年來妥協路線，重新走向「伊斯蘭國」路線，以推動伊斯蘭化政策爲政黨目標。因此，他們只與意識型態較爲相近的小黨共組和諧陣線，堅持不與希盟或巫統合作。換言之，若該政黨是以政策目標作爲最高考量時，則會堅持立場使其符合黨的政策路線，有必要時甚至進行政策改革(Laws 2018, 8)。我們可發現伊斯蘭黨在2018年大選期間，不斷強調伊斯蘭化政策，以凸顯其與希盟、國陣的差異性，另外，在選擇盟友時，它只與同樣支持伊斯蘭化意識型態的政黨結盟。<sup>11</sup> 由上可知，伊斯蘭黨在2018年大選時出現了一個重大轉變——從「追求官職」變成「追求政策」，而這樣的轉變對於馬來西亞的族群投票型態產生極大的影響。易言之，伊斯蘭

---

<sup>11</sup> 所謂政策導向的政黨聯盟，並非意指這類政黨在所有偏好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他們會共同關注某一項政策。有些學者指出由政策導向政黨所形成的政黨聯盟，其執政品質會比由沒有原則性、只爲勝選的政黨聯盟爲佳(Tummala 2009)。原因很簡單，這是因爲強調有理念的政黨，會尋求與其意識型態相近的政黨組成選前聯盟，此類聯盟在勝選後組成政府、推動政策都會比較順利；反之，只求勝選的政黨所合組的聯盟，可能在選後因爲理念衝突、利益不合而造成聯盟破局。

黨的路線轉變讓馬來選民在投票時有了新的選項，進而使得國陣向來仰賴的族群投票模式失靈。

根據投票研究的社會學途徑（又稱「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選民的政治態度往往是經由家庭與所屬社會團體所形塑，因此，選民在進行投票抉擇時，往往會考量階級、族群或宗教等社會因素(Lazarsfeld et al. 1944)。在選舉時，如果選民本身與候選人具有相似的社會背景，則會比較傾向投給這個候選人(Lipset and Rokkan 1967; Leighley and Vedlitz 1999)。在馬來西亞，大多數的研究皆指出「族群」為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鍵因素(Bala-subramaniam 2006; Brown 2006; Pepinsky 2015; Saravanamuttu 2004)。由於巫統與伊斯蘭黨的主要支持基礎皆為馬來人，理應相互競爭的程度會很高，因此，巫統在每次大選的競選期間，皆傾全力批評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合作是對馬來人的背叛(Frith 2007, 127)，這種負面選舉手法常會影響馬來選民，讓他們不敢冒著重蹈1969年大選時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贏得多數選票的風險，而投票給跟在野聯盟合作的伊斯蘭黨(Brown 2005, 6)。簡言之，由於強烈的不安全感，不少馬來選民寧可選擇支持國陣，也不願支持伊斯蘭黨。

然而，伊斯蘭黨在2018年選舉堅持推動伊斯蘭化政策，成為「追求政策」的政黨，一改過去只重視「追求官職」的作法。由於伊斯蘭黨離開原先的在野聯盟另立門戶，少了一個與民主行動黨合作的「政治包袱」，使得巫統無法將伊斯蘭黨貼上「馬來人叛徒」的標籤，也因此能拉攏那些先前對它與民主行動黨結盟有疑慮而不敢投伊斯蘭黨的馬來穆斯林選民。簡言之，伊斯蘭黨競政策目標的改變，吸引更多認同伊斯蘭黨族群與宗教屬性的選民，也使得國陣在此次大選中無法有效操作族群投票的選舉策略，失去不少基本盤選票。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可驗證的假設：「在伊斯蘭黨有派出候選人參選的選區，國陣獲得較少選票」，並將在下一節透過量化研究設計針對這個假設進行驗證。

## 參、國陣選票為何流失？量化模型的檢證

### 一、研究設計

本節將透過量化實證分析，探討伊斯蘭黨在2018年國會選舉的參選如何影響巫統的選票流失及國陣的敗選。本文的分析單位為馬來西亞的國會選區，主要使用的選舉資料為西馬來西亞（西馬）選區層次的選舉結果。由於東馬與西馬的政黨背景、族群組成、政治文化都大相逕庭，本文根據先前研究指出東馬（沙巴、砂拉越）的選舉資料的特殊性，不適宜放入資料庫(Ng, et al. 2015, 169)，又加上本研究關注的伊斯蘭黨在東馬所提名的候選人微乎其微。因此，本研究僅專注於分析西馬12個州、總計165個國會議員選區。

本文實證分析的主要依變數為「2018年國陣候選人在該選區的得票率」，其平均值為33.99%，標準差為13.35%，最大值為96.82%，最小值為7.92%。為了驗證伊斯蘭黨的參選是否會對於國陣選舉結果造成影響，模型中的自變數為「伊斯蘭黨候選人在2018年是否在該選區參選」（1=參選；0=未參選）。在165個西馬國會選區中，伊斯蘭黨在142個選區有派出候選人參選，在其餘的23個選區則無派人參選。上述依變數與自變數的資料來源為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sup>12</sup> 根據本文的理論假設，我們預期自變數應帶負向效果，亦即在伊斯蘭黨候選人參選的選區，國陣候選人預期將有較低的得票率。

同時，本文的實證模型亦檢驗既有文獻對於國陣此次敗選的不同解釋觀點。首先，為了考量馬哈迪出走巫統另行成立土團黨對於國陣選情的可能影響，本文控制「土著團結黨候選人是否在該選區參選」（此變數與自變數的相關係數為0.202），預期在土團黨參選的選區，國陣候選人應該會獲得較少的選票。其次，為了考量族群比例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我們在模型中控制了三個變數：「2018年馬來裔選民在該選區的比例」、「2018年華裔選民在該選區的比例」、「2018年印度裔選民在該選區的比例」。上述這些變數因為選舉委員會並無相關資料，因此資料來源取自馬來西亞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The

<sup>12</sup> 請參見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pru14.spr.gov.my/#!/parliament>。

Star。<sup>13</sup> 就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預期在國陣在馬來裔選民較多的選區會有較好的選舉表現，而在華裔選民與印度裔選民較多的選區，國陣的選舉表現應較差。

第三，有些研究認為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比較容易出現反抗威權政府的集體行動(Glaeser and Steinberg 2017; Wallace 2013)。由於有不少研究指出馬來西亞近年來的都市化程度愈來愈高，使得國陣流失許多固有支持者(Funston 2018; Pepinsky 2015, 200)。Jason Wei Jian Ng等(2015, 190-191)的量化分析發現，在城市選區中，不論是馬來或非馬來選民，皆傾向投票給在野聯盟，而鄉村地區的中低階層馬來族群則較支持國陣。<sup>14</sup> 爲了考量都市化程度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本文按照Pepinsky(2015)的作法，控制「選區面積」（以平方公里爲單位並取自然對數），預期在較大的選區，由於都市化程度較低，國陣應該會獲得較多的選票。該變數的資料來源爲Election Commission of Malaysia(2018)。

就模型設定而言，本研究採取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的迴歸分析模型對於依變數加以估計。由於國陣在各州得票的觀察值彼此間並不相互獨立，因此，我們加入Huber / White / sandwich 穩健變異的估計(robust variance estimator)，並以州爲單位予以集群(clustered)，使係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在調整過後成爲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此外，爲了考量各州獨有的文化與歷史特性對於依變數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讓模型允許各個分析單位間存在差異性。換言之，爲了捕捉各州本身無法觀察到的異質性(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我們採取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在模型中加入各州的虛擬變數，並以吉隆坡作爲參照組(reference group)。<sup>15</sup>

<sup>13</sup> 請參見The Star網站：<https://election.thestar.com.my/>。

<sup>14</sup> Rahman(2018a)的研究指出在此次選舉中，鄉村馬來選民的投票行爲因居住地、年齡、性別等差異而呈現很大的異質性。

<sup>15</sup> 由於我們的資料結構並不是時間序列(time series)資料，並無依變數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情況，所以從模型設定的角度來看，並無必要控制前期依變數(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然而，若在模型中加入「伊斯蘭黨在2013年的得票率」，「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這個變數的結果與表1模型2的結果並沒有很大的差異（請見附錄模型A1）。

## 二、分析結果

如下表（表1）所示，本研究估計兩個OLS模型，模型1為隨機效果模型，模型2則為固定效果模型。這兩個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伊斯蘭黨參選與否確實對於國陣的得票率造成影響。具體而言，在考量各州異質性的固定效果的模型2裡，其結果顯示，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伊斯蘭黨有派出候選人參選的選區，國陣候選人的得票率平均來說會少6.8%左右，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得到了實證資料的支持，亦即伊斯蘭黨在2018年國會選舉的參選，在選區層次上讓國陣減少許多選票，進而影響了國陣的選舉表現。

表1 2018年國陣在西馬選區的得票率分析

變數	模型1	模型2
	(OLS；隨機效果)	(OLS；固定效果)
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	-6.419# (3.429)	-6.746* (2.508)
土著團結黨有派人參選	5.175* (2.036)	3.583 (2.095)
馬來人比例	-1.912 (2.036)	-0.991 (19.614)
華人比例	-24.237 (28.283)	-39.803# (20.383)
印度人比例	-23.305 (29.798)	-19.915 (20.442)
選區面積（取自然對數）	3.994** (1.099)	3.507** (0.474)
常數項	24.098 (29.254)	35.684 (20.128)
各州虛擬變數（吉隆坡除外）	無	有

變數	模型1 (OLS ; 隨機效果)	模型2 (OLS ; 固定效果)
R-squared	0.621	0.787
樣本數	165	165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州集群之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顯著水準：<sup>#</sup>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

至於其他變數，表1亦呈現相當有趣的結果。例如，既有文獻主張2018年國會大選馬哈迪出走巫統造成了執政集團精英分裂，其所率領的土著團結黨若參選，在理論上應該會對於國陣的得票造成影響，但模型1的結果卻顯示，在土著團結黨參選的選區，國陣的得票率反而得到顯著的提升，增幅約5%。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模型2的結果卻顯示，在土著團結黨參選的選區，對於國陣的得票率並沒有出現統計上顯著的變化。因此，由上述兩個模型的統計結果可推知，在國會選區的層次上，土團黨參選與否和國陣得票率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非常明確。

此外，表1的分析結果顯示，選區面積的迴歸係數為正向，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這樣的結果代表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選區，國陣能得到較多的選票，這個研究發現支持了都市化理論的假設，呼應了既有文獻的發現(Ng et al. 2015)。至於各族群比例的變數，模型1的結果顯示這些變數的係數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模型2的結果則顯示，在華人人口愈多的選區，則國陣的得票率較低，且這個效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然而，馬來人比例與印度人比例這兩個族群變數，在模型2中並沒有具統計上顯著的效果。

為了更謹慎地檢驗統計結果是否足以支持本研究關於伊斯蘭黨的理論假設，我們檢驗不同的依變數，額外進行了兩個穩健性檢測(robustness check)。在表2中，模型3的依變數為「國陣在2013年與2018年兩次選舉於該選區得票的成長率」，亦即以2018年的得票率減去2013年的得票率再除以2013年的得票率，並以OLS模型加以估計。按照本文的假設，可預期在伊斯蘭黨參選的選區，國陣的得票應會呈現負成長。

表2 穩健性檢測OLS模型

變數	模型3 (OLS；依變數 = 國陣在2013年與2018年兩次選舉 得票的成長率)
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	-10.310*** (1.119)
土著團結黨有派人參選	3.365 (3.489)
馬來人比例	21.242 (38.819)
華人比例	9.828 (37.076)
印度人比例	-14.013 (45.546)
選區面積（取自然對數）	3.721** (0.939)
常數項	-59.395 (37.826)
R-squared	0.260
樣本數	164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州集群之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顯著水準：<sup>#</sup>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

另外，儘管模型1與模型2的結果顯示在伊斯蘭黨參選的選區，國陣候選人得票數減少，但這樣的情況，可能並不影響國陣候選人的當選。為了考量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將依變數換為「國陣候選人是否在2018年是否在該選區勝選」(1 = 勝選，0 = 敗選)並重新進行統計分析，請見表3的模型4，由於該變數

是二分變數，所以我們以Logit模型加以估計。<sup>16</sup>

表3 穩健性檢測Logit模型

變數	模型4 (Logit; 依變數 = 國陣候選人是否勝選)
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	-1.252*** (0.248)
土著團結黨有派人參選	1.426** (0.461)
馬來人比例	-12.745 (7.918)
華人比例	-16.875* (7.386)
印度人比例	-15.167# (8.713)
選區面積 (取自然對數)	0.879*** (0.268)
常數項	7.758 (8.393)
Pseudo R-squared	0.396
樣本數	165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州集群之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顯著水準：<sup>#</sup>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

從表2及表3的穩健性檢測結果來看，有關伊斯蘭黨參選變數的結果，亦未出現很大的變化。就模型3的結果而言，在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2018年大選

<sup>16</sup> 模型3與模型4的依變數與表1的依變數「國陣在2018年得票率」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765與0.681。



的選區，國陣得票率的成長率為-10.3%。模型4的結果則顯示，在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2018年大選的選區，國陣候選人當選的機率愈低；若以此結果為基礎，我們可計算出勝算比(odds ratio)為0.286，亦即：「與伊蘭黨競爭的國陣候選人」當選的勝算，為「未與伊斯蘭黨競爭的國陣候選人」的0.286倍。換言之，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國陣候選人在面對伊斯蘭黨候選人的挑戰時，其當選的勝算減少71.4%。簡言之，從上述的四個估計模型結果來看，我們發現伊斯蘭黨的參選，對於國陣的選舉表現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此，本文的主要理論假設得到實證的支持，其結果頗為穩健。

## 肆、伊斯蘭黨的發展、選舉策略轉變以及2018年大選的過程

上節的實證分析顯示，伊斯蘭黨脫離原先的在野聯盟自行參選，確實一定程度削弱了國陣的選舉支持。本節將整理伊斯蘭黨的歷史背景、探討其與巫統的分合關係，進而說明巫統與伊斯蘭黨所吸引的選民具有同質性，也因此當伊斯蘭黨在此次選舉「獨立參選」會侵蝕了巫統的固有票源，讓一些不滿巫統的馬來選民有了新的選擇。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文亦將針對伊斯蘭黨發展的歷史變遷進行爬梳，藉以呈現其政黨目標轉變的脈絡與政治過程。

### 一、伊斯蘭黨的發展與兩線政治

在二十世紀初期，馬來半島穆斯林依照其祖先原生地及意識型態的不同可分為兩類。William R. Roff(1994: 75-78)將第一類稱為「老世代」(*Kaum Tua*)；第二類稱為「新世代」(*Kaum Muda*)。前者屬於在馬來半島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強調民族主義重於宗教；後者的祖先多來自中東、南亞地區，較強調伊斯蘭主義。老世代在1940-1950年代的反殖民時期，為了維繫傳統以馬來蘇丹為首的權力結構，動員保守馬來穆斯林群眾反對英國提出的「馬來亞聯盟」計劃，最後成功迫使英國與馬來精英重新協商出較有利馬來族群的新方案，這一群馬來民族主義精英後來組成巫統。另一方面，新世代為宗教意識濃厚的伊斯蘭主義者，由於他們有較強烈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及改革主義思想，不滿老世代

謹遵傳統馬來皇室為首的傳統思維，因此他們在1948年組成「馬來亞穆斯林黨」(*Hizbul Muslimin*)，成為馬來西亞最早將伊斯蘭與政治相連的馬來西亞政黨(Nair 1997, 16-17)，其目標是追求馬來亞獨立，並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Darul Islam*)(Hassan 2007, 291)。

由於1948年6月18日馬來共產黨發動武裝抗爭之故，英國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許多政黨相繼被強制解散，馬來亞穆斯林黨也是其中之一。在缺乏政治舞台的情況下，有些馬來亞穆斯林黨黨員只能選擇再回到巫統，但他們加入巫統後發現巫統高層並不重視伊斯蘭，也不贊同將馬來西亞建立為伊斯蘭國家。於是，前穆斯林黨黨員阿罕(Ahmad Fuad)便號召志同道合人士，於1950年2月、1951年8月及11月舉辦三場馬來亞伊斯蘭宗教學者大會(*Perjumpaan Alim Ulama Tanah Melayu*)，並在會後決定成立「泛馬來亞伊斯蘭協會」(*Persatuan Islam Se-Malaya*)(Wan Jan 2018, 133)。1951年11月24日，這個協會脫離巫統，改成立一個新政黨—「泛馬來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Malaya*)，阿罕乃是第一屆的黨主席。1971年，該黨改名為「泛馬來西亞伊斯蘭黨」(此即本文簡稱的伊斯蘭黨)並沿用迄今，而伊斯蘭黨的黨員及支持者多以鄉村地區吉蘭丹州(Kelantan)及登嘉樓州(Terengganu)的農漁民為主(Kessler 1978, 241-242, Funston 1980, 52)，上述兩州在人口組成上以馬來裔佔了95%以上，穆斯林人口比較極高，屬於馬來西亞較為傳統保守的區域。

伊斯蘭黨共有過七任主席，第一任是阿罕(Ahmad Fuad, 1951-1953)、第二任是阿巴斯(Abbas Alias, 1953-1956)、第三任是布哈努丁(Burhanuddin al-Helmy, 1956-1969)、第四任是阿斯里(Mohd Asri Muda, 1969-1982)、第五任是尤索夫(Yusof Rawa, 1982-1988)、第六任是法茲諾(Fadzil Mohd Noor, 1989-2002)、第七任是哈迪阿旺(Abdul Hadi Awang, 2002至今)。從歷史上來看，伊斯蘭黨在不同的黨主席領導的時期，其發展重點及意識形態有著明顯的差異。

1951年到1956年期間，伊斯蘭黨主要著重於馬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反對英國殖民政府，以及關注馬來人的社會經濟議題。到了1956年至1969年，當時的黨主席布哈努丁是個左翼馬來民族主義者，他在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前，強力批判西方殖民主義，積極爭取國家獨立；在獨立建國之後，他則是重視馬來民族主義以及馬來族群發展等議題，並非伊斯蘭宗教性議題。因此，1950年

代中至1960年代的伊斯蘭黨的主張比較具有妥協性色彩(Noor 2004, 145-147)。

自1969年至1982年，伊斯蘭黨的黨主席阿斯里屬於偏向右翼的馬來民族主義者。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May Thirteen Incident)族群衝突爆發之後，在1973年，阿斯里帶領伊斯蘭黨加入國陣政府，因為當時伊斯蘭黨與巫統都希望馬來人能團結，才能共同對抗華人(Noor 2004, 229-230)，此乃開啟了伊斯蘭黨與巫統的第一次合作關係。但在加入國陣不久後，伊斯蘭黨與巫統開始產生意見衝突。起因在於1974年巫統委任了納西爾(Mohamed Nasir)出任吉蘭丹州的州務大臣，引發伊斯蘭黨內部的派系鬥爭。1977年底，吉蘭丹州興起一波罷免潮，最後演變成民衆大規模示威運動，此即「丹州事件」。於是，國陣政府宣佈吉蘭丹州進入緊急狀態，宣布該州暫由中央政府接管，直到1978年選舉為止；同時，國陣政府亦將伊斯蘭黨逐出國陣。退出國陣後的伊斯蘭黨因黨內分化嚴重而造成形象受損，1978年大選只有聶阿茲(Nik Aziz Nik Mat)、法茲諾、哈迪阿旺、慕斯達法(Mustapha Ali)等人當選國會議員、州議員，伊斯蘭黨也失去了長期執政的吉蘭丹州政權。

自1982年尤索夫當選黨主席後，為了回應當時全球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風潮，開始提倡「烏拉瑪」(*ulama*, 意指宗教學者)治國，主張全面恢復伊斯蘭律法(*Sharia*)，包含伊斯蘭刑法，並提出建立「伊斯蘭國」的主張(Mutalib 1990, 113-114, Noor 2004, 330)，戮力推動伊斯蘭改革。另外，伊斯蘭黨也派遣代表前往伊朗參訪(Nair 1997, 74)，回國後在黨領導層之上設立「烏拉瑪協理事會」(*Majlis Sura Ulama*)，作為對黨的伊斯蘭教義之最高詮釋機構，使該黨成為宗教學者領導的政黨，而非一般世俗政黨。

1989到2002年的黨主席法茲諾，以及2002年之後的黨主席哈迪阿旺，都維持伊斯蘭主義的路線(Muhammad 1994; Noor 2004)。但伊斯蘭黨為了勝選，自1990年起開始與民主行動黨、公正黨合作，形成「兩線制」的政治競爭模式(祝家華 1994)。1999年大選，伊斯蘭黨獲得27席國會議席，乃是伊斯蘭黨選舉史上贏得最多國會席次的一次。然而，伊斯蘭黨在2004年大選慘敗，僅得6席國會議席。

伊斯蘭黨在2004年大選面臨挫敗，主要是因為巫統以「文明伊斯蘭」(*Islam Hadhari*)成功建構出溫和伊斯蘭的形象，反將伊斯蘭黨妖魔化為極端、激

進的政黨 (Hamayotsu 2010, 168)。當伊斯蘭黨越是強調伊斯蘭精神與理念，越被形塑為極端、激進的形象，於是害怕馬來西亞變成伊斯蘭國家的選民，不論非馬來裔或馬來裔，都寧願將選票投給巫統以求維持現狀(Lim and Har 2008, 30-34)。伊斯蘭黨在選舉大敗受到教訓之後，黨內人士開始檢討是否應該修正「伊斯蘭國」的政策路線，以獲取更多民衆的支持。

在2008年大選時，伊斯蘭黨改變了政策路線，提出「福利國」(*Negara Kebajikan*)<sup>17</sup> 政策，強調伊斯蘭黨追求實踐自由、正義、民主、善治等價值，而不再堅持將馬來西亞建立成伊斯蘭國家。<sup>18</sup> 從2008年選舉結果來看，伊斯蘭黨共贏得23席國會議席；在州議會選舉方面，伊斯蘭黨贏得吉蘭丹州執政權，也與公正黨一同執政吉打州，以及與行動黨、公正黨聯合執政霹靂州、雪蘭莪州，選舉成果算是十分輝煌。

2010年，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公正黨共同簽署「橘皮書」(*Buku Jingga, Orange Book*)，內容是有關未來民聯執政將推動的國家整體目標及行政規劃。伊斯蘭黨進一步提出「伊斯蘭黨為全民服務」(*PAS Untuk Semua, PAS for all*)的口號，強調伊斯蘭黨是開放、寬容性的政黨，能夠與非穆斯林政黨合作，共同推動馬來西亞的民主化(Mohd Izani 2017, 9-12)。此便說明了伊斯蘭黨當時的最高目標，乃是取得不分族群選民的支持，以獲取政府職位，即便得罪基本教義派、損失基本盤選票也在所不惜。

然而，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的選舉結盟時常引發衝突，因為彼此的理念、利益、意識形態完全不同，例如：伊斯蘭黨鎖定的選民以馬來穆斯林為主，特別強調伊斯蘭化政策，例如伊斯蘭黨在其執政的吉蘭丹州及登嘉樓州承諾要推動伊斯蘭刑法，這讓華人感到恐懼與不滿(Lim and Har 2008, 27-29)。而民主行動黨的主要支持者為華人，他們較重視華人教育及文化的保存，以及追求經濟利益，但對於伊斯蘭教並不了解、且充滿偏見與排斥。因此，每次在選

---

<sup>17</sup> 詳細內容參見PAS. 2008. *Manifesto of 12th General Election: A Trustworthy, Just and Clean Government*。

<sup>18</sup> 關於哈迪阿旺對於福利國的定義，請見網站：<https://mmpanakjohor2012.wordpress.com/2012/04/04/negara-berkebjikan-tawaran-pas-kepada-rakyat-malaysia/>，檢索日期：2020年8月20日。

戰時只要討論到伊斯蘭議題，兩黨便會引發激辯與衝突。在伊斯蘭黨精神領袖聶阿茲還在任的時候，伊斯蘭黨尚能與民主行動黨透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彼此的政策路線歧異。但在2015年2月聶阿茲逝世之後，兩黨衝突升高到極點，最後導致主導伊斯蘭黨內保守派正式與民主行動黨及公正黨分道揚鑣，而伊斯蘭黨內的開明派則退黨重組新勢力。

## 二、伊斯蘭黨與和諧陣線的成立

在伊斯蘭黨黨內，本存在保守派及開明派之爭。保守派鎖定傳統保守的馬來穆斯林選民，主張要讓馬來西亞成為伊斯蘭國家，並推動伊斯蘭刑法。而開明派想要爭取的是全國政權，他們認為現階段必須先妥協讓步，以溫和的姿態推動伊斯蘭化，尋求其他族群選民的理解與支持。待取得政府大位之後，再逐步實踐黨的目標。<sup>19</sup> 聶阿茲屬於伊斯蘭黨的開明派，他在世時能與行動黨及公正黨黨主席直接對話，進行溝通協調，也因此伊斯蘭黨之前提出「福利國」主張，此便奠定了伊斯蘭黨能夠與民聯其他政黨合作的基礎。

然而，在2015年2月聶阿茲逝世之後，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的意識形態衝突越演越烈，因為沒有人能像聶阿茲扮演著緩衝者、協調者的角色，於是2015年6月15日，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宣布斷交，民聯也正式解體。另一方面，聶阿茲逝世也造成伊斯蘭黨黨內權力重組、保守派與開明派的鬥爭白熱化。保守派及開明派為了是否與巫統合作議題爭執不下，保守派認為與巫統合作並非完全不可行，而開明派則批評巫統貪腐，不應與之為盟。<sup>20</sup> 保守派認為與巫統合作比跟其他政黨合作有利，因為巫統也是捍衛馬來族群權益的政黨，而且擁有執政優勢，較有利於推動伊斯蘭刑法的實施。而開明派認為，伊斯蘭黨與巫統合作只會被利用，更何況人民對於國陣貪腐的印象已根深蒂固，與其合作必損害伊斯蘭黨清廉的形象。

<sup>19</sup> 相關報導請見李志良，2015，〈伊黨兩派分道揚鑣 帶動大馬政治重組〉，東方日報，6月14日，<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88299>，檢索日期：2020年5月12日。

<sup>20</sup> 詳細報導請見劉鎮東，2015，〈巫伊結盟及對大馬的影響〉，當今大馬，12月19日，<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323934>，檢索日期：2020年5月13日。

由於堅持「伊斯蘭國」路線的保守派在2015年黨選時贏得多數重要職位，7月15日，伊斯蘭黨內開明派決定全員退黨，成立「新希望運動」(*Gerakan Harapan Baru*)，並欲註冊一新政黨「進步伊斯蘭黨」，但申請被駁回。後來，這些開明派成員轉而加入馬來西亞工人黨(*Parti Pekerja-Pekerja Malaysia*)，而後將該黨易名為國家誠信黨，並於2018年大選時與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合組希望聯盟共同競選。當開明派退黨之後，伊斯蘭黨便由保守派的哈迪阿旺全權主導，也走回了1982年以來的「伊斯蘭國」路線—以堅定推動伊斯蘭化政策作為政黨最高目標。<sup>21</sup> 因此，本文主張，伊斯蘭黨2018年選舉時的選戰策略是從「追求官職」轉向「追求政策」。

2016年3月16日，伊斯蘭黨與國民團結黨(*Ikatan Bangsa*)組成「第三聯盟」，在8月13日宣布將此聯盟正式命名為和諧陣線。伊斯蘭黨領導人哈迪阿旺強調，選民已厭倦目前兩大陣營的政治鬥爭，和諧陣線為選民提供另一個新的選項。國民團結黨成立於2012年6月7日，是由前巫統政治精英阿都卡迪賽法茲(*Abdul Kadir Sheikh Fadzir*)所創立。他曾擔任馬哈迪及阿都拉(*Abdullah Badawi*)首相時期的馬來西亞新聞部長(1999-2006)、馬來西亞文化、藝術及旅遊部長(1997-2004)，2012年他因不滿巫統內部鬥爭而退黨，並成立新政黨。此政黨的宗旨在於實現馬來西亞國父東姑拉曼的誓言，要建立一個族群團結、進步、公正、幸福的馬來西亞。國民團結黨邀請了東姑拉曼的孫子東姑穆努丁普特拉(*Tunku Muinuddin Putra*)擔任該黨的副主席。然而，該政黨在2018選舉時並未贏得任何國會議席及州議席。

2016年9月23日，伊斯蘭陣線(*Barisan Jemaah Islamiah Se-Malaysia*)宣布加入和諧陣線。伊斯蘭陣線是由前吉蘭丹首席部長納西爾(*Mohamed Nasir*)於1977年成立，之後加入國陣成為一員。該黨在1982年大選贏得了4個席位，但在1986年大選時，為了抗議國陣接納「穆斯林人民黨」(*Parti Hizbul Muslimin Malaysia*)而退出國陣。1990年大選，伊斯蘭陣線加入了由46精神黨(*Parti Me-*

---

<sup>21</sup> 相關報導請見“Hadi: Negara Kebajikan ala British tiada roh Islam.” (Hadi: The British-style Welfare State has no Islamic spirit) *Malaysiakini*, August 4, 2017.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90925> [accessed August 19, 2020].

layu Semangat 46)所領導的「穆斯林團結陣線」(*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在野黨聯盟，並成功贏得一個席位。然而，此聯盟於1996年大選後解散，而46精神黨也重新加入巫統。2016年，伊斯蘭陣線加入了和陣，2018年選舉時提名三個候選人參選，但最終並未贏得任何席次。

### 三、伊斯蘭黨在2018年大選中的競選過程

先前量化分析結果顯示，伊斯蘭黨在2018年大選的參選，對於巫統的支持造成不小的衝擊。相較於2013年大選，伊斯蘭黨在2018年的國會席次雖然有所減少，但總體票數卻從166萬餘票進步到203萬餘票，一定程度反映了其競選策略改變是成功的。其次，在選舉資料來看，伊斯蘭黨在馬來選民較多的選區，能取得較多選票：伊斯蘭黨的得票率與馬來選民比例的相關係數高達0.78，相對而言，巫統的得票率與馬來選民比例的相關係數則只有0.49。<sup>22</sup>

伊斯蘭黨在1990年起，曾加入數個在野黨聯盟，包括：穆斯林團結陣線、替代陣線、民聯，在這段時期的總得票率，最高的紀錄是在2004年獲得15.2%的選票支持(Noor 2014, 177)。2018年選舉則為近30年來伊斯蘭黨第一次自立門戶、獨立競選，期間還經歷黨內鬥爭及分裂，但此次選舉的總得票率卻再創新高，獲得16.64%的選票支持(Saidin 2018, 5)。反觀脫離伊斯蘭黨開明派所組成的誠信黨，僅獲得5.37%的選票支持，而且其中不少選票可能來自於希盟其他成員黨的支持者。

本研究認為，伊斯蘭黨在馬來選民集中的選區有亮眼表現，<sup>23</sup> 主要是因為該黨在此次選舉特別強調要推動伊斯蘭化政策，而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在戰術上，伊斯蘭黨選擇與巫統保持亦敵亦友的關係。首先，在開明派退黨之後，保

<sup>22</sup> 在考量樣本數的情況下，我們利用Stata統計軟體的cortesti語法檢驗兩個相關係數的差異，結果顯示兩者的差異達統計上的顯著。

<sup>23</sup> 我們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建議應利用統計模型驗證這個說法。為此，我們重新估計一個OLS模型，將依變數設為伊斯蘭黨在2018年的得票率，自變數包括族群變數以及各州的虛擬變數。模型結果（請見附錄的模型A2）顯示，馬來族群變數的統計係數為正向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此外，在馬來人特別集中、而且PAS在過去有執政經驗的吉打、吉蘭丹、登加樓三州，其統計係數皆為正向且達統計上的顯著。綜言之，這些結果顯示在馬來人愈多的選區，PAS得票愈高。

守派開始與巫統接觸，並出現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2015年12月，納吉向哈迪阿旺伸出橄欖枝，欲洽談兩黨合作事宜。<sup>24</sup> 在和諧陣線成立後，2017年2月1日，納吉和哈迪阿旺同台亮相，聲援緬甸羅興雅人。<sup>25</sup> 2月17日，當希盟再次試圖邀請伊斯蘭黨加入在野聯盟，哈迪阿旺重申不願與民主行動黨和誠信黨為伍的立場。<sup>26</sup> 2017年5月表示，哈迪阿旺表示，伊黨與巫統的合作將會是成熟的政治合作關係。<sup>27</sup> 除此之外，不少輿論也支持巫統與伊斯蘭黨合作，反而認為伊斯蘭黨若加入希望聯盟，會對其未來發展不利。<sup>28</sup>

然而，在2017年7月15日，伊斯蘭黨秘書長達基尤丁(Dato' Takiyuddin bin Haji Hassan)表示，伊斯蘭黨長老協商理事會已通過決議，絕對不會在2018年大選時跟巫統合作。<sup>29</sup> 慕尤丁表明，由於巫統與伊斯蘭黨對「伊斯蘭法庭（刑事權限）修正法案」（簡稱U355法案）<sup>30</sup> 有所共識，因此，針對這個法案，伊斯蘭黨可以與中央政府合作，以便該法案在國會順利通過。但對於2018年大選，伊斯蘭黨明確指出將會在各選區推出自己候選人，並不因該選區現任者

<sup>24</sup> 相關報導請見潘君勝，2015，〈伊斯蘭黨開始分裂？〉，東方日報，12月23日，<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19125>，檢索日期：2020年5月13日。

<sup>25</sup> 相關報導請見李志良，2017，〈納吉哈迪週五再同台亮相〉，東方日報，12月23日，<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82676>，檢索日期：2020年5月10日。

<sup>26</sup> 相關新聞請見Mynewshub. 2017. “PAS Tolak Kerjasama Parti Ada Hubungan Dengan DAP”（伊黨拒絕與行動黨有關係的政黨合作），Mynewshub, <http://www.mynewshub.cc/utama-sensasi/pas-tolak-kerjasama-parti-ada-hubungan-dgn-dap-amanah/> [accessed May 14, 2020].

<sup>27</sup> 相關報導請見Berita. 2017. “Hadi Awang: Kerjasama PAS-UMNO adalah politik matang”（哈迪阿旺：伊黨與巫統合作是成熟的政治），<https://berita.mediacorp.sg/mobilem/dunia/hadi-awang-kerjasama-pas-umno-adalah-politik-matang-politik/3707140.html> [accessed May 10, 2020]

<sup>28</sup> 相關新聞請見：Bernama. 2017. “Kerjasama UMNO-Pas perkukuh perpaduan orang Melayu – Mustapa”（巫統伊黨合作使馬來人團結），Astro Awani Berita, <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politik/kerjasama-umno-pas-perkukuh-perpaduan-orang-melayu-mustapa-141883>，檢索日期：2020年5月14日；以及FMT Reporter. 2017. “Ku Li: Tidak salah jika Umno, PAS bentuk kerjasama hadapi PRU”（Ku Li：巫統伊黨聯手面對選舉無罪），<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bahasa/2017/05/13/ku-li-tidak-salah-jika-umno-pas-bentuk-kerjasama-hadapi-pru/> [accessed May 16, 2020]

<sup>29</sup> 相關報導請見東方日報，2017，〈伊黨立場堅定大選不與巫統合作〉，東方日報，7月15日，<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204804>，檢索日期：2020年5月17日。

<sup>30</sup> 相關報導請見丘偉榮，2018，〈伊斯蘭政治角力戰〉，當代評論，5月5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8/05/05/1-68/>，檢索日期：2020年5月19日。



是巫統黨員而放棄提名。

深入來看，伊斯蘭黨與巫統合作推動U355法案，主要是爲了獲得中央政府對伊斯蘭化的支持，以及得到地方財源資源上的挹注；若這個法案在國會通過，伊斯蘭黨便可向選民宣傳其推動伊斯蘭化的政績，有利於其選舉表現。

除了與巫統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之外，另一方面，伊斯蘭黨則會依據不同州屬選民的偏好與特性，設計在地化的選戰主軸。在2018年選舉期間，伊斯蘭黨因應吉打州與吉蘭丹州選民偏好，哈迪阿旺特別建構出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國願景(Saat 2018, 2)，以及展現出要推動實施伊斯蘭刑法的決心(Sani 2019, 248)，藉以區隔自己與國陣及希盟的差異性。因此，有學者主張伊斯蘭黨之所以在此次選舉成績優異，便是因爲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化路線十分鮮明，藉由了解在地的需求，提出保障在地選民利益的政策(Mohamed Nawab and Rashaad 2018, 365)，也因此伊斯蘭黨可以憑一黨之力，贏得了吉蘭丹州及登嘉樓州過半數以上的州議席，並組成州政府。反觀希盟所派出的誠信黨、公正黨的候選人在這些州屬全部敗北。

不同於吉打及吉蘭丹州的策略，伊斯蘭黨在登嘉樓選民首先展現出伊斯蘭黨揚棄「追求官職」的策略，一方面宣布哈迪阿旺不會在他的優勢選區Ru Rendang競選州議員，同時也承諾若伊斯蘭黨勝選取得勝選，哈迪阿旺不會被提名爲州務大臣(*Menteri Besar*)。其次，伊斯蘭黨首次改以較柔性的姿態吸引馬來穆斯林選票，宣布要追求「成熟且進步的政治文化」(*Budaya Politik Matang Sejahtera*)爲目標。<sup>31</sup> 評論家認爲伊斯蘭黨讓自己成爲巫統之外的另個選項，而非與希盟（世俗政黨）合作，對其選情大有好處。<sup>32</sup> 由於伊斯蘭黨的新政策宣稱已結束長期與巫統對峙的局面，此讓馬來選民不需要在選擇巫統意亦或伊斯蘭黨而感到爲難，選後證明這的確對伊斯蘭黨的選票有所加分。

---

<sup>31</sup> 相關評論請見Mohamed Nawab Mohamad Osman. 2018. "Why PAS surpassed expectations in Malaysia's GE and is new forbearer of Malay politics." Today Online, May 18, 2018. <https://www.todayonline.com/commentary/why-pas-surpassed-expectations-malaysias-ge/> [accessed August 20, 2020].

<sup>32</sup> 相關評論請見Welsh, Bridget. 2018. "A Truly Malaysian Election." East Asia Forum, May 15,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5/15/a-truly-malaysian-election/> [accessed August 20, 2020].

再者，不同於以往的作法，伊斯蘭黨為避免重蹈哈迪阿旺以往的強硬作風引發民怨，在2018年選舉過程中避免用「變節者」(takfiri，意指信仰不堅的穆斯林)去攻擊巫統黨員，避免讓人民覺得若沒支持伊斯蘭黨就會遭受責罵與詛咒(Khan 2018)，<sup>33</sup>同時也可以讓人民對伊斯蘭黨過去強勢的形象改觀，希望能藉此拉攏更多的選民支持。

另外，伊斯蘭黨研擬出符合在地需求的選戰策略，例如在登嘉樓州大打「經濟牌」，而非伊斯蘭牌，便是一個非常細膩且接地氣的策略。伊斯蘭黨在登嘉樓的競選之所以不以伊斯蘭刑法議題為選戰主軸，是因為他們評估登嘉樓的經濟問題遠比宗教議題更切身相關。為了改善登嘉樓的經濟處境，伊斯蘭黨所提出的選舉承諾，都是跟人民福利相關，包括在未來四年期間提供兩萬個工作機會，提供免費水給低收入戶，老人年金每人每月馬幣50元，提供基本醫療補助一年最高補助馬幣500元(Ganti 2020, 259)。而且此也呈現出伊斯蘭黨記取過去教訓，伊斯蘭黨曾在1999大選伊斯蘭黨贏得登嘉樓州的執政權，之後巫統懲罰登嘉樓州，刪減近馬幣2億美元的建設經費，等同減少了80%登嘉樓州的年度預算，伊斯蘭黨當時僅關注伊斯蘭刑法議題，並未對經濟發展議題特別關心，也因此伊斯蘭黨在2004年失去執政權。

從選舉結果來看，伊斯蘭黨在登嘉樓大有斬獲。在2013年選舉時，巫統及伊斯蘭黨於登嘉樓州各贏得4個國會議席。而在2018年大選，伊斯蘭黨共贏得6席國會議席，此時所增加的2席，就是從原本巫統所掌握的選區而來。在州議會選舉方面，伊斯蘭黨贏得32席中的22個席次，比上次選舉增加了8席，終於拿回睽違14年之久的登嘉樓州執政權，被稱之為「綠色海嘯」(Green Tsunami)。<sup>34</sup>

<sup>33</sup> 相關評論請見 Rosli Khan. 2018. "Time running out for PAS in Terengganu." Malaysiakini. January 21, 201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09396> [accessed August 20, 2020].

<sup>34</sup> 相關評論請見 Saat, Norshahril. 2018. "Green Tsunami in East Coast of Peninsula Malaysia." *ISEAS Commentaries*, May 10, 2018. <https://www.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green-tsunami-in-east-coast-of-peninsula-malaysia-by-norshahril-saat/> [accessed August 20, 2020].

## 伍、結論

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標誌其61年來首次政黨輪替，不僅影響馬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更為民主化文獻增添一個重要的案例。國陣在這次大選落敗其實令人是出乎意外之外的，國陣原本以為在野黨聯盟選前出現重大分裂能有利於選情(Abdullah 2020, 278; Sani 2019, 247)，但國陣最後大敗，並失去執政權。既有文獻指出，前首相馬哈迪退出巫統加入在野聯盟乃是吸引馬來選民「倒戈」的關鍵因素。然而，相關的文獻大多缺乏系統性的實證分析，無法對「馬哈迪因素」進行細膩的評估。

為了進一步探討國陣敗選的原因，本文結合政黨政治與族群投票的理論觀點，主張伊斯蘭黨將其競選策略從「追求官職」轉向「追求政策」乃是導致國陣敗選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的量化分析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伊斯蘭黨有推出候選人的國會選區，國陣候選人的得票率往往較低。相對而言，馬哈迪領軍的土團黨，對於國陣的得票並未造成統計上顯著的影響。這樣的實證分析結果，除了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設，也對於強調「馬哈迪因素」的文獻，提供了一個反思。

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文亦透過案例研究進一步探討本文假設的因果機制。本文發現伊斯蘭黨在此次選舉之所以能獲得更多馬來選票，主要是因為該黨堅持推動伊斯蘭化政策目標，並且不與巫統合作。同時，伊斯蘭黨在此次選舉之前，退出了先前的在野聯盟，被視為與華人為首的民主行動黨切割，這讓伊斯蘭黨少了一個「政治包袱」，有利其建立「伊斯蘭捍衛者」的形象。此種做法除了讓巫統無法以「馬來人的叛徒」來攻擊伊斯蘭黨，更因此吸引了長期不滿巫統、卻因為之前對於伊斯蘭黨與民主行動黨合作有所疑慮而不敢支持伊斯蘭黨的馬來穆斯林選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黨競選策略的轉變，並非為了刻意削弱國陣，而是內部政治鬥爭下的結果。因此，國陣這次敗選，可說是伊斯蘭黨改變其競選策略的「非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綜合而言，本研究除了對於馬來西亞首次政黨輪替提供了系統性的解釋，更從政黨政治與族群投票的角度，對於競爭式威權體制的研究文獻，提供了一

個補充觀點。本研究顯示，執政精英的分裂固然可能加速競爭式威權體制的民主轉型，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在野黨陣營的分裂，有時也會產生撼動執政黨的既有選舉支持。

## 附錄

變數	模型A1	模型A2
	(OLS；依變數 = 國陣在 2018年選舉的得票率)	(OLS；依變數 = 伊斯蘭黨 在2018年選舉的得票率)
國陣在2013年選舉的 得票率	0.396*** (0.072)	—
伊斯蘭黨有派人參選	-6.003** (1.521)	—
土著團結黨有派人參選	2.702 (2.163)	—
馬來人比例	10.091 (21.618)	40.432* (17.684)
華人比例	-10.777 (21.903)	9.933 (19.134)
印度人比例	-1.299 (21.033)	27.578 (25.641)
選區面積 (取自然對數)	2.518*** (0.427)	-0.251 (0.468)
玻璃市州	-0.560 (0.816)	2.585 (1.993)
吉打州	-11.315*** (1.066)	9.863*** (1.495)
吉蘭丹州	-1.623 (1.759)	21.695*** (2.311)
登嘉樓州	-5.173* (1.835)	23.366*** (2.348)
檳州	0.862 (0.576)	-1.182 (1.098)

變數	模型A1	模型A2
	(OLS ; 依變數 = 國陣在 2018年選舉的得票率)	(OLS ; 依變數 = 伊斯蘭黨 在2018年選舉的得票率)
霹靂州	-1.109 (1.069)	3.894* (1.415)
彭亨州	-2.178 (1.471)	7.672** (2.082)
雪蘭莪州	-7.090*** (1.042)	0.659 (1.024)
森美蘭州	4.492** (1.110)	-4.982** (1.464)
馬六甲州	0.135 (0.793)	-7.340*** (1.148)
柔佛州	0.643 (1.285)	-5.073* (1.717)
常數項	3.679 (21.776)	-12.475 (18.682)
R-squared	0.817	0.818
樣本數	165	152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州集群之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顯著水準：<sup>#</sup> p ≤ 0.1; \* p ≤ 0.05 ; \*\* p ≤ 0.01; \*\*\* p ≤ 0.001。

## 參考文獻

### I. 中文部分

- 王國璋，2018，《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Wang, Guozhang. 2008. "Ma lai xi ya min zhu zhuan xing zu qun yu zong jiao zhi kun" [*Democratic Transition of Malaysia: The Dilemma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宋鎮照、洪鼎倫，2018，〈宗教與種族的訴求在馬國大選中失靈〉，《海峽評論》，330: 11-16。
- (Soong, Jenn-jaw, and Ding-lun Hong. 2018. "Zong jiao yu zhong zu de su qiu zai ma guo da xuan zhong shi ling" [The Religious and Racial Appeals Failed in the Malaysian Election]. *Strait Review Monthly* 330: 11-16.)
- 孫采薇，2016，〈選區分配與族群投票：從馬來西亞2013年國會大選評析馬國政黨輪替的瓶頸〉，《政治學報》，61: 57-85。
- (Sun, Tsai-wei. 2016. "Xuan qu fen pei yu zu qun tou piao: cong ma lai xi ya 2013 nian guo hui da xuan ping xi ma guo zheng dang lun ti de ping jing" [Electoral System and Ethnic Voting: The 2013 Malaysian Elections and Afterward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57-85.)
- 祝家華，1994，《解構政治神話：大馬兩線政治的評析(1985-1992)》，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
- (Thock, Kiah Wah. 1994. "jie gou zheng zhi shen hua da ma liang xian zheng zhi de ping xi (1985-1992)" [*Deconstructing Political Myths: A Review of Malaysia's Two-Coalition Politics (1985-1992)*].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 潘永強主編，2019，《未鞏固的民主：馬來西亞2018年大選》，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Phoon, Wing Keong. 2019. "wei gong gu de min zhu ma lai xi ya 2018 nian da

xuan” [*Unconsolidated Democracy: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游雅雯，2017，〈國民陣線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憲政體制、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之影響〉，載於《優勢政黨與民主：亞洲經驗的省思》，孫采薇、吳玉山主編，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Yu, Ya-wen. 2017. “guo min zhen xian yu ma lai xi ya de zheng zhi fa zhan xian zheng ti zhi heng dang zhi yu xuan ju zhi du zhi ying xiang” [The National Front and Malay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stem,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System]. In you shi Zheng Dang yu min zhu ya zhou jing yan de xing si [*Dominant Parties and Democracy: Reflections on Asian Experiences*], eds. Tsai-wei Sun and Yu-shan Wu.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 II. 英文部分

Abdullah, Najwa. 2020. “Intra-Islamist Elite Competition in Kelantan.” In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 eds.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n. New York: Routledge. 271-290.

Abdullah, Walid Jumblatt. 2019. “The Mahathir Effect in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The Role of Credible Personalities in Regime Transitions.” *Democratization* 26(3): 521-536.

Albrecht, Holger. 2010.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Oppos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Balasubramaniam, Vejai. 2006. “Strengthening Ethnic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ole of Tactical Voting in Multi-Racial Malaysia.” *Asian Ethnicity* 7(1): 75-88.

Brown, Graham. 2006. “Playing the (non)ethnic card: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Ethnic Voting Patterns in Malaysia”. *Ethnopolitics* 4(4): 429-445.

Brownlee, Jason. 2009. “Portents of Pluralism: How Hybrid Regimes Affect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3): 515-32.



- Bunce, Valerie J., and Sharon L. Wolchik. 2010. "Defeating Dictators: Electoral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orld Politics* 62(1): 42-86.
- Case, William. 2009.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Malaysia: Trajectory Shift." *Pacific Review* 22(3): 311-333.
- Chin, James. 2018. "The Comeback Kid: Mahathir and the 201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7: 535-537.
- Chin, James, and Bridget Welsh, eds. 2018. "The 201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 The Return of Mahathir and the Exit of Umno."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special issue) 37(3): 3-206.
-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 Donno, Daneila. 2013.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3): 703-716.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alaysia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Malaysia]. 2018. *Laporan Kajian Semula Persempadanan Mengenai Syor-Syor Yang Dicapadangkan Bagi Bahagian-Bhagian Pilihan Raya Persekutuan Dan Negeri Di Dalam Negeri-Negeri Tanah Melayu Kali Keenam Tahun 2018 Jilid 1* [Boundary Review Report: The Sixth Recommendations for Federal and State Electoral Divisions in Malay Peninsula, 2018]. <https://www.spr.gov.my/sites/default/files/Jilid%201%20Kajian%20Semula%20Persempadanan%20V2.pdf> (Last accessed: 8/29/2020).
- Evans, Matt. 2018. "Policy-Seeking and Office-Seeking: Categorizing Parties Based on Coalition Payoff Allocation." *Politics & Policy* 46(1): 4-31.
- Frith, Tabitha. 2000. "Ethno-Religious Identity and Urban Malays in Malaysia." *Asian Ethnicity* 1(2): 117-129.
- Funston, John. 2018.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 the Contest for the Malay Electorate."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7(3): 57-83.

- 1980.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A Study of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and Party Isla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Gaddes, Barbara. 1999.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 Ganti, Wan Rohilla. 2020. "The Green Tsunami in Terengganu: The Re-Emergence of Parti Islam Se-Malaysia." In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 eds.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n. New York: Routledge.
- Glaeser, Edward L., and Bryce Millett Steinberg. 2017. "Transforming Cities: Does Urbanization Promote Democratic Change?" *Regional Studies* 51(1): 58-68.
- Golder, Sona N. 2005.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Test of Existing Hypotheses." *Electoral Studies* 24(4): 643-663.
- Gomez, Edmund Terence, and 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n, eds. 2020.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 New York: Routledge.
- Hamayotsu, Kikue. 2010. "Crises of Identity in PAS and Beyond: Islam and Politics in Post 8 March Malaysia."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99 (407): 163-175.
- Hassan, Muhammad Haniff Bin. 2007. "Explaining Islam's Special Position and the Politic of Islam in Malaysia." *The Muslim World* 97(2): 287-316.
- Howard, Marc Morjé and Philip G. Roessler. 2006.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365-381.
- Hutchinson, Francis E. 2018.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s: Drivers and Agents of Change." *Asian Affairs* 49(2): 582-605.
- Indridason, Indridi H. 2005. "A Theory of Coalitions and Clientelism: Coalition Politics in Iceland, 1945-2000."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4(3): 439-464.
- Kananatu, Thatchaayini. 2018. "The Politico-Legal Mobilisation of Ethnic Indians

- before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7(6): 703-716.
- Kellam, Marisa. 2015. "Why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in Presidential Syste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2): 391-411.
- Kessler, Clive S. 1978. *Islam and Politics in a Malay State: Kelantan 1838-196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w, Mike. 2018. "When Foes Become Friends and Friends Become Foes: Party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of Coalitions."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in "*Political Party Coop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of Coalitions in South Africa Initiative*" Symposiu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 Lazarsfeld, P.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 Leighley, Jan E., and Arnold Vedlitz. 1999.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peting Models and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1(4): 1092-1114.
- Lemière, Sophie. 2018. "The Downfall of Malaysia's Ruling Pa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29(4): 114-128.
- Lim, Kim-Hui and Wai-Mun Har. 2008. "Ad Baculum, Islamic State and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s: A Rhetorical Study of Selected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in the Local Chinese Media during the 11th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1(1): 25-39.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51-65.
-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and Rokkan 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Luebbert, Gregory M. 1986. *Comparative Democracy: Policy-making and Governing. Coalitions in Europe and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galoni, Beatriz. 2006.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1992.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eds.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oniruzzaman, M., and Kazi Fahmida Farzana. 2018.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End of an Epoch, and Beginning of a New." *Intellectual Discourse* 26(1): 207-228.
- Monshipouri, Mahmood. 1995.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ohamed Nawab Osman, Mohamad and Rashaad Ali. 2018. "Localising Victory: GE 14 and the Electoral Contests in Johor and Kelantan." *Jebat* 45 (2): 367-385.
- Moten, Abdul Rashid. 2019.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s in Malaysia: Ethnicity, Party Polar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sian Survey* 59(3): 500-520.
- Muhammad, Alias. 1994. *PAS's Plat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Kuala Lumpur: Gateway Publishing House.
- Mutalib, Hussin. 1990.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dzri, Muhamad M. N. 2018.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he Fall of Barisan Nas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1957-2018."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7(3): 139-171.
- Nair, Shanti. 1997. *Islam in Malay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 Ng, Jason Wei Jian, Gary John Rangel, Santha Vaithilingam, and Subramaniam S. Pillay. 2015. "The 2013 Malaysian Elections: Ethnic Politics or Urban Wav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2): 167-198.
- Noor, Farish A. 2004. *Islam Embedd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n-Ma-*

-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03*.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2014.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13*.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stwald, Kai and Steven Oliver. 2020. "Four Arenas: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sation* 27(4): 662-680.
- Parry, Geraint, and Michael Moran. 1994. "Introduction: Problems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eds. Geraint Parry and Michael Moran. New York: Routledge.
- Pepinsky, Thomas. 2015. "Interpreting Ethnicity and Urbanization in Malaysia's 2013 General Elec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2): 199-226.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him, Mohd Helmi Abd, Novel Lyndon, and Nazrin Shahnaz Peer Mohamed. 2017. "Transforming Political Advertising in Malaysia: Strategizing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Towards First-Time and Young Voters in Malaysian GE 14." *Malay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1): 356-367.
- Rahman, Serina. 2018a.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s 2018: Understanding the Rural Vote*.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 2018b. "Was It a Malay Tsunami? Deconstructing the Malay Vote in Malaysia's 2018 Election."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7(6): 662-682.
- Roff, William R. 1994.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at, Norshahril. 2018. "Will PAS Governments in Kelantan and Terengganu Push for Islamic Laws?" *ISEAS Perspective* 33: 1-7.
- Saidin, Mohd Irwan Syazil. 2018. "Did Malaysians Vote Islamists? Reflections on

- PAS and AMANAH in the 2018 General Election.” *Alsharq Forum* (November 2018): 1-8
- Sani, Mohd Azizuddin Mohd. 2019. “Parties Versus Personalities in Kedah Politics: Unstable and Hung State Assembly in Kedah’s GE14.” In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and UMNO’s Fall*, eds.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n. New York: Routledge.
- Saravanamuttu, Johan. 2004. “Malaysian Multicultural Policy and Practices: Between Communalism and Consociationalism.” In *Challenge of Ethnicity: Building a Nation in Malaysia*, ed. Boon Kheng Cheah.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89-105.
- Schedler, Andreas. 2002. “Election without Democracy: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36-50.
- Slater, Dan. 2003. “Iron Cage in an Iron Fist: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in Malay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36 (1): 81-101.
- 2010.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rensen, Georg. 1993.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Westview Press.
- Sithanen, Ramakrishna. 2003. “Coalition Politics under the Tropics: Office Seekers, Power Makers, Nation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Mauritius.” presented at *EISA Roundtable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through Coalition Building*. <http://aceproject.org/ero-en/topics/parties-and-candidates/mauritius.pdf> (Last accessed 12/20/2019).
- Strøm, Kaare. 1990.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2): 565-598.
- Tummala, Krishna K. 2009. “Coalition Politics in India: 2004-2009.”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3): 323-348.
- Ufen, Andreas. 2020. “Opposition in Transition: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and the 2018 Electoral Breakthrough in Malaysia.” *Democratization* 27(2): 167-184.

- Wallace, Jeremy. 2013. "Cities, Redistribu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Surviva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5(3): 632-645.
- Wahman, Michael. 2011. "Offices and Policies: Why do Oppositional Parties Form Pre-Electoral Coalitions." *Electoral Studies* 30(4): 642-657.
- Wan Jan, Wan Saiful. 2018. "Islamism in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plintering of the 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 (PAS) and the Spread of Progressive Ideas." *Islam and Civilisational Renewal* 9(4): 128-153.
- Welsh, Bridget. 2018. "'Saviour' Politics and Malaysia's 2018 Electoral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Rethinking Explanatory Narrativ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7(3): 85-108.
- Wong, Chin-Huat and Kee Beng Ooi, eds. 2018. "Regime Change in Malaysia: GE14 and its Importance."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ecial issue) 107(6): 661-823.
- Zain, Mohd Izani Mohd. 2017.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dalam kerjasama politik di Malaysia, 1999-2015*.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under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Malays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 Opposition Parties' Electoral Strategies and the Defeat of Dominant Part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and the 2018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Ya-Wen Yu\*

## 《Abstract》

Since Malaysia's independence in 1957, the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led *Barisan Nasional* (BN) coalition government governed Malaysia for 61 years, maintaining a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system. However, Malaysia experienced its first-ever party turnover in May 2018.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Malaysia's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system collapse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two key explanations for BN's electoral defeat: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and Mahathir causing a split among the governing elites. Combin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party politics and ethnic vot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arti Islam Se-Malaysia's*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change of policy objective also was a factor in explaining BN's electoral defeat. Specifically, the PAS changed its goal from "office-seeking" to "policy seeking." In order to promote Islam, the PAS cut ties with the opposition coalition that it had joined for the past 20 years, because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conflicted with the PAS with respect to its Islamization policy. The PAS established a new party coalition and focused on promoting Islam, which helped the PAS gain support from the Malay Muslim voters who had not voted for PAS because of its previous alliance with the DAP. Accordingly, this study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mkang University.



hypothesizes that the PAS undermined BN's electoral performance.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this study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data from 165 electoral districts in West Malaysia.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N's electoral support was largely undermined in the districts where the PAS contested the election.

**Keywords:** Malaysia, *Parti Islam Se-Malaysia*,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Barisan Nasional*

